

# 谈《辘轩语》和《书目答问》

屈守元

《辘轩语》和《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在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先后主持编写的两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书。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达,又字香涛(或作芑涛),号香严,又号壶公,一称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人。他是清末有名的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他的功过,这里不准备作全面评说。他的事迹,简要的可读《清史稿》卷四三七本传;较详尽的可看许同莘编著的《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版)。

张之洞在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六月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八月任四川学政使。他任学政报到后上疏说:“四川省分,人文素优”;“弊端亦较他省为甚”。“臣惟有首励以廉耻,次勉以读有用之书;至于剔弊摘奸,惟力是视”(《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160页)。

次年(一八七四),他认为省城(成都)旧有锦江书院,造就不广,商之当时四川总督吴棠,另外创建一所尊经书院。次年(一八七五)春建成,选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后来(光绪四年,即一八七八)聘王闿运为山长(当时吴棠、张之洞已去,继任总督为丁宝楨、学政为谭宗浚)。

又根据当时制度,学政分地区按试入学的秀才,完毕后,集中他们在一起,赏优罚劣,申以督戒。这种作法,当时叫做“发落”。他用书面写了《发落语》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这个《发落语》后来依杨雄《方言》本名《辘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之义,取名《辘轩语》。“辘轩”是轻车。据杨雄《答刘歆书》(章樾注本《古文苑》卷十)、应劭《〈风俗通义〉序》和郭璞《〈方言〉序》说,周、秦时代曾有派遣使者乘辘轩采风的作法,张之洞认为学政的职责有点象辘轩之使,故以名书。

《辘轩语》刊行时,除《语行》、《语学》、《语文》三篇之外,又有《学究语》、《敬避字》、《磨勘条例》、《劝置学田说》等四篇,都是专为当时生员(秀才)进行说教的。

《书目答问》与《辘轩语》同时写成(《辘轩语》只署光绪元年,未确定月日;《书目答问》署光绪元年九月,它的成书可能在《辘轩语》之后)。张之洞说它是“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因而有此作。书前有《略例》十条,全书五卷,卷一至四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目,卷五为丛书目,又附录两种,一为别录目(包括群书读本及初学、幼学各书),一为《清代著述诸家姓名总目》。所以《清史稿·艺文志》史部书目类著录为张之洞《书目答问》七卷,它是并附录两种一起记入卷数的。

《辘轩语》出自张之洞之手,自来无异词。《书目答问》因为缪荃孙自撰《艺风老人年谱》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因此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柳诒徵《〈书目答问补正〉序》和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跋》都认为此书为缪荃孙代撰。陈垣(援庵)先生撰写了《〈艺风年谱〉与〈书目答

问》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图书季刊》)驳正此说。据

《半声厂所见书目序》(见《艺风文续集》卷五;此即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序,今载邵书首),认为缪荃孙当时在吴棠幕中,对张之洞此书,只是“随同助理”而已;助理者还有后来编刊《式训堂丛书》的章寿康(硕卿,见缪荃孙所作《章硕卿传》)。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今中华书局新印本《书目答问补正》的序文采用了此说)。然而缪荃孙代撰之说,仍然还有影响,最近《中国哲学》第二辑发表顾颉刚先生遗文《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在《书目答问》作者张之洞名下注明:“实际上是缪荃孙”。张之洞的官很大,缪荃孙后来又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权威,人们相信“代撰”之说,不免有这样一些先入之见。其实,光绪初年,张之洞作学政的时候,四川的目录学颇为风行。章寿康刻衢州本《郡斋读书志》,钱保塘(兰陂,铁江)撰《晁公武事辑》(附蜀刻衢本《读书志》),即在此时。这些都不能说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写作没有关系。而且,缪荃孙自己说“撰《书目答问》四卷”,但刊行的《书目答问》连附录在内却是七卷,张之洞自己定稿,这已无庸多说。缪荃孙所助理编纂者,不过是经、史、子、集四卷而已,全书的完稿,他并没有始终其事;“撰”字之前,他自己没有用“代”字。《艺风老人自订年谱》实在不能作为缪荃孙“代撰”的依据。

《辘轳语》颇近于对话体。对于当时“士习得失,文学利病,不惜竭知详说”。“其间颇甚浅近,间及精深”。“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戒”(并见序言)。它的《语行》一篇,提出“人品高峻”,“立志远大”,“砥厉气节”,“出门求师”,“习尚俭朴”诸条,虽说至今仍有点借鉴意义,但它是针对那个时代的士林风气说的,提出的要求亦不可能与今天相比,所以作用不大,可取不多。《语文》主要是谈那时秀才应考的“时文”(即“八股”)、“试律诗”、“律赋”等,和今天

无关,与《学究语》以下四篇,都已成为只该送进博物馆的东西了。《语学》是它的重要部分,可以和《书目答问》参阅,颇有价值。

《书目答问》虽然作者自谦,说:“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略例》)。但它“所取既博,条例复明,实为切要之书”(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癸集二,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四日,见《越缦堂日记》第三十一册)。鲁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到弄文学该看什么书时,曾说:“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而已集·读书杂谈》)它确实是“行之海内数十年,稍知读书者,无不奉为指南”(《书林余话》卷下)的一部书。它的价值,至今仍不能忽视。

《辘轳语》和《书目答问》,为初学者导读古籍,它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曰指路。这两部书都很强调读书要摸索门径。《辘轳语·语学》提出“读书宜有门径”,说:“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入,事半功倍。”又说:“至于经注,孰为师授之古学,孰为无本之俗学;史传孰为有法,孰为失体,孰为详密,孰为疏舛;词章孰为正宗,孰为旁门。尤宜决择分析,方不致误用聪明。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一书名,省文可称《四库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又说:“《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以下列举经学、小学、韵学、史学、诸子、诗文、学书等等的门径书籍。观其所举,容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大体是正确的。《书目答问》卷二在《史部·谱录类·书目之属》下注也说:“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途径。”又在《略例》里提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为了提供读书门径,《书目答问》附二特别写了《国朝(指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说:“读书欲

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他认为“大抵徵实之学，今胜于古”。“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又说：“行县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反覆思之，无从措手。今忽思得其法，录为此编。虽不能尽，大略在焉。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果能循途探讨，笃信深思，虽僻处深居，不患冥行矣。”顾颉刚先生少年时曾受到这个《姓名略》的启示，编辑《清代著述考》，他晚年还叹息：因为当时条件不具，“使得这一部可以供应中国近代学术研究者查考的工具书”没有“早日问世”（《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见《中国哲学》第二辑）。门径的确是初学者必须探讨的一项首要任务。

二曰奠基。阅读古籍，有一些必须奠定的基础。大抵古人著述，都是先熟悉经传、小学、诸子，并不是这些书的价值都很高，但它们的影响却是客观存在；你不熟悉它们，便触处碍足碍手。张之洞很重视这个问题。

《籍轩语·语学》开头便说：“为学之道，岂胜条举？根柢工夫，更非寥寥数行所能宣罄。此为初学有志者约言之，乃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也。”以下在《通经》一目中，先举“读经宜读全本”、“解经宜先识字”两条；《读史》一目中先列“宜读正史”、“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宜读《通鉴》”、“宜读《通考》”四条；《读诸子》一目中，列“读子宜求训诂、看古注”一条；《读古人文集》一目中，列“词章宜读专集”、“读昭明《文选》宜看注”、“浅学读《文选》亦宜看全本”诸条：都是奠基之论，所谓“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语学》篇中，特立“读书宜多读古书”一条，说：

“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他把“三

代古传记”、“周秦间诸子”、“汉至隋说经之书”、“汉至隋小学之书”、“汉后隋前传记诸子”凡七十一种，列举其目。所论虽有偏颇局限，但作为阅读古籍的基础知识，是很值得重视的。《书目答问》就是立足于奠定阅读古籍所必需的基础知识的。书中亦随处指点此事，如卷一《经部·小学类》目后注云：“此类各书，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钤键。”我们现在不也是把古代汉语的学习作为古代文、史、哲诸学的专业基础吗？张之洞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

三曰鉴裁。我国古籍，浩如烟海。不加以比较，是无法鉴别其良窳的。张之洞很注意这个鉴裁的问题。但是鉴别从比较开始，比较当然不能墨守一先生之言，所以《籍轩语·语学》中有“读书宜博”一条，说：“先博后约，《语》、《孟》通义。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若株守坊本讲章一部，免园册子数帙，而云致知穷理，好学能文，世无其理。”这里所说的，即是比较、鉴裁与博、约的关系。又说：“天下书老死读不可偏，博之为道将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古书不可不解（真者不多，真古书无无用者）；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不限古今）；专门之书不可不详考贯通（立志为何等学问，此类书即是专门）；如是则有涯涘可穷矣。”这里所说的“有要”，即是鉴裁。“读书贵博，贵精，尤贵通”一条云：“该贯六艺，斟酌百家，既不少见而多怪，亦不非今而泥古，从善弃瑕，是之谓通。若夫偏袒一家，得此失彼，所谓是丹非素，一孔之论也。然必先求博，则不至以臆说俗见为通；先须求精，则不至以掘乱无主为通。不博不精，通字难言。初学慎勿借口。”这里把博、精和通，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说得很透辟。鉴裁的基础，就建筑在通字上面。《书目答问》里往往在通字的基础上，作出言简意赅，十分准确的鉴裁性的注语，如卷四《集部·别集类》著录杜诗，它列了《杜诗详注》和

《杜诗镜铨》，注说：“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著录苏诗，它列了《苏诗合注》、《苏诗编注集成》和《苏诗补注》，注说：“苏诗宋施元之注最有名，查慎行补注亦善，冯、王、翁三注更详备。”又说：“冯详事实，王兼论诗”。这种语言多么干脆利落！在没有新出超越前人的校注之前，这确是不易之论。又如《总集类》，它列了些诗文选本，注说：“近人诗文选本太多，举其不俗谬者。”又说：“沈选《别裁》通行，不详列。”《辘轳语·语学》中“读后世诗文选本宜择善者”一条，特举姚鼐《古文辞类纂》，说它“最为善本。为其体例分明，评点精妙，校讎详审”。诗选举了郭茂倩《乐府诗集》，说它“源流具在”。又说：“坊行五诗《别裁》，虽有科臼，然平正不入恶道”。而且指明：“若《观止》、《释义》太陋，不足用。”这些鉴裁，都是很有分量的。有分量的鉴裁，对于初学者，也是一块有用的指路碑。

四曰劝勉。要在大量的古籍中有所继承，有所创造，若无坚强的毅力是不会有什麼成就的。《辘轳语·语学》中有许多激发士人意志的条文，今天仍有它的积极作用。如“读书不必畏难”、“读书勿诿记性不好”、“读书勿诿无书无暇”、“买书勿吝”诸条，都能做到箴规奋励，发人深省。如“读书勿诿记性不好”一条云：“每见今人不好读书者，辄以此借口，此欺人也。日记一叶，月记一卷，十年之内，可记百余卷矣。非不能，实不为耳。”又“读书勿诿无书无暇”一条云“能购购之，不能借之。随得随看，久久自富。若必待插架三万，然后议读，终身无此日矣。即使四部骈罗，岂能一日读尽？何如姑尽所有，再谋其他？更有一蔽，劝人读书，多谓无暇。不知嬉游昼寝，为暇多矣。一叶数行，偶然触目，他日遇事，或即恰收其用。”这些话今天仍可用来劝勉惰游之士。为了增强读书收效的信念，他还在“读书不必畏难”一条里提出“读书一事，古难今

易”的说法，指出清代朴学家“最好著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他列举“蒐补”、“校订”、“考证”、“谱录”等清儒所作的诸项工作，说：“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前人甚苦（在前人却于己无大益，校书及注古集尤甚），后人甚乐。诸公筑室，我辈居之；诸公利器，我辈用之（今日止须善买书，读书便省力，易见效）。士生今日，若肯读书，真可不费无益之精神（若无诸公，自考之，则甚劳；不考之，则多误），而取益身心，坐收实用。”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讲话，今天有更多的前人、今人整理成果，愈应该加强收益的信心了。《书目答问·略例》中说：“庸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汎滥者当知学有流别。”又指出《书目》中所列二千余部书，“诸生当知其约，勿骇其多”。这些说法，也是用以增强好学深思的读者的信念的。

张之洞的《辘轳语》和《书目答问》是一百年前为四川生员（当时的知识分子）写的。那时候的四川知识界情况、张之洞写了这两部书和他所作的一些有关工作所取得的效果，他死后（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四川总督赵尔巽、提学使赵启霖转上四川在籍翰林院编修伍肇龄等的奏摺中讲得比较清楚，奏摺说：“（上略）原任大学士张之洞，学术渊深，风规宏远。历官各省，无不以崇尚儒术，修明文教为先。其前在四川学政任内，兴废举坠，明教作人，沾溉之宏，造就之广，尤有历久弥思者。先是，川省僻处西陲，人文未盛。士林之所驰骛，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自同治季年，该大学士典试西来，始拔取绩学能文之士，如武谦、吴德溍诸人，以为之倡，士风始为一变。旋奉命提督四川学政，则会商前督臣吴棠，奏设尊经书院，择郡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延聘名儒，分科讲授。院内章程，及读书治经之法，皆该大学士手订。条教精密，略如诂经精舍、学海堂规模。复以边省购书不易，捐置四部书数千卷，起

尊经阁度藏之，借供生徒浏览。并开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流布坊间，以备士人诵习之资。自是比户横经，远近景慕，蜀中乃彬彬多文学矣。（中略）所著《书目答问》、《辘轳语》二书，流传海内，几于人手一编，即该大学士在蜀校士时所随时撰录，导士人以求学之津梁者也。所取之士，如范溶、张祥龄、宋育仁诸人，皆经明行修，极一时之选，为该大学士所深器，尝引之左右，躬自督课。其后或置身通显，为国家文学侍从之臣；或潜心著述，以绍明绝学、师表人伦自重；类能守其绪余，克自树立。教泽所及，全川化之。迄今学校大兴，人材蔚起，文化之程，翹然为西南各省最。盖非该大学士陶镛诱掖之力，断不及此。（下略）”这个奏摺是官方文件，自不免有些饰词，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真实情况，很值得重视（原奏载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第224—225页）。

张之洞是很重视培养人材的，他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去四川学政任；次年（一八七七）正月还在西安与新任学政谭宗浚写信，向他推荐“蜀才”，有所谓“四校官”、“五少年”。“四校官”指郫县教谕杨聪、雅安教谕萧某、署茂州训导李星根、梁山教谕谭涣廷。“五少年”指杨锐、廖登廷、张祥龄、彭毓嵩、毛瀚丰（见《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0页）。这些人物不仅影响近代学术文化，而且影响近代政治。杨锐（叔峤）和另一个四川先进人物刘光第（裴村），不就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献出生命的有名“六君子”中的两位吗（《清史稿》卷250页）？廖登廷即经今文学家大师、《六译馆丛书》的作者廖平（季平）。戊戌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长素），根据他的弟子梁启超自说，他是“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的，“有为之思想，受其（指廖平）影响，不可诬也”（见《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26—127页）。章炳麟说得更具体，他说：“君（指廖平，下同）之学凡六变”，“而康氏（指康有为）所受于君者，特其第二

变也”（《太炎文录续编》卷五下《清政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谈起近代史，要重视康有为的作用，也就不应该忘记了廖平，而廖平正是在四川写《辘轳语》和《书目答问》的张之洞所选拔、培养的“五少年”之一。

《辘轳语》和《书目答问》在学术史上的影响，不是四川，而是全国。余嘉锡（季豫）先生不是看到《辘轳语》“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一语，而引起治学写书的兴趣的吗（见《四库提要辨证·序录》）？陈垣（援庵）先生不是“看到一本《书目答问》，‘立刻被这本书吸引住’，因而研究文史的吗（《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见一九八〇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陈垣校长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据我所知，我所接触到的前辈诸老先生，大抵都是从这两部书入门，走上治学的康庄之途的。这两部书在近代学术史上立下的功绩，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

当然，《辘轳语》和《书目答问》的出版问世，迄今已一百零七年（这两部著作的楷书精刻本都是光绪二年，即一八七六年在成都印行的），《书目答问》尽管有江人度的《笺补》（光绪三十年即一九〇四年汉川江氏刻本）、赵祖铭的《校勘记》（光绪中沔阳卢氏刊《慎始基斋丛书》本）和通行的范希曾的《补正》（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五年国学图书馆两次印本，一九六三年、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前后影印本），但对于今天的古籍整理发展形势，仍已显得颇为落后。新的类似《辘轳语》和《书目答问》的指导治学途径的书刊，须得重写。然而，在不偏不陋的这类著作未出现之前，作为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权威性的这两部书，还有借资参考，值得刊布的价值。《书目答问》已有新印本问世；而《辘轳语》则知之者还是不多。鄙意谓印《书目答问》时，将《辘轳语》的《语学》一篇摘出作为附录，将是对初学治古籍者的福音，也是有助于整理古籍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